

二十世纪外国教育名著译丛

教育问题史

TI SHI
JIAO YU WEN

PROBLEM

JIAO YU

安徽教育出版社

G40-01

04



二十世纪外国教育名著译丛

教育问题史

安徽教育出版社

教育问题史

〔美〕约翰S.布鲁柏克 著

吴元训 主译

吴元训 校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芜湖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75 字数: 400,000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00

ISBN 7—5336—0610—8/G·1085

定价: 7.90元

“二十世纪外国教育名著译丛”编委会

主 编:	乔卫平	程方平		
副主编:	滕 星	程培杰		
编 委:	王大虎	赵连杰	吴儒深	王伟廉
	邓正来	张铁明	黄新宽	张诗亚
	张俊洪	丁 钢	付维利	王 箭
	覃光广	吴忠魁	邵 威	毕 诚
	钱荣琰	姜维静	扈中平	毛祖桓
	桑思奋	恽耀荣	翟大林	吕 达
	韩书玉	俞启定	刘海峰	邹平生
顾 问:	陈友松	吴元训	毛礼锐	任宝祥
	杨树勋	赵祥麟	滕大椿	滕 纯

“二十世纪外国教育名著译丛”总序

程方平

我国是一个有悠久教育传统的文明古国，有许多宝贵的教育遗产和伟大的教育家，这是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财富，也是我们的包袱。过去我们走在世界的前列，但进入二十世纪，我们逐渐落后了。我们的前人，如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严复、陈独秀、蔡元培、鲁迅、胡适、陶行之、杨贤江、黄炎培等努力向西方寻求教育的新路，引进、改造和实践了各种先进的教育理论，为我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今天，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对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表示了极大的需求。

首先，我们的教育理论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且还常被引入歧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科学的对待。为了发展和进步，必须丢掉包袱，放眼世界，缩小我们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其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国家间、地区间的交往会日益密切，为了在这些文教交往中提高我国学者与先进国家学者对话的层次，翻译和出版国外教育名著已成为当前的迫切需求。第三，二十世纪是个“分析的时代”，（英国当代哲学家莫尔顿·怀特语）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科学方面的著名学者。人们把教育看成是人类的基本需求和所有

资源中最大的资源，（见英国人 E·F·舒马赫著《小的是美好的》一书）并把它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日本以教育立国，美国把教育看成是国防之外“最大的一项事业”，（见霍伯特·乌·伯恩斯的《教育基础知识丛书》介绍）苏联持续不断地进行教育改革，英国冲破传统正规教育的束缚首创“开放大学”，法国则最早提出“终身教育”的理论问题，所有这些重要的教育实践和改革，都有相应的教育理论为依据，并不断修正和创造出新的理论。这些理论包含了世界教育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精萃，是我们必须借鉴的理论。第四，由于我们和许多先进国家的教育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某些国家目前的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碰到。如教育观念的转变、教育的评价与视导，职业与升学指导。边远和落后地区教育的发展，教育与人口的增长，教育与国家发展等等。在这些方面，国外的科研与调查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教训，可以作为我们研究对策和制定计划的重要借鉴。第五，对于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和教师来说，通过学习和研究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可以改变其传统观念，为其提供先进的教育思想、方法和技术等，改变教育队伍的素质。我国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者的缺陷之一就是不能从多视角和多层次来分析和观察教育问题，陷入传统的教育中不能自拔，并且还缺乏对自身问题的认识，特别没有危机感。过去有不少教育家和学者注意引进国外的先进理论来冲击我国陈旧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观，现在这种需要更强烈了。

编译二十世纪外国教育名著，我们是经过长期的缜密考虑的。在老一辈教育家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下，我们逐渐学会如何来看待世界、分析世界，如何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有了组织编译这部“译丛”的信心。近些年来翻译引进的国外著作不少，而且的确在社会上产生不小的影响，教育思想界也渐渐地活跃起

来。但是，我们也看到，由于过去我们引进、介绍得太少，国内学者获取国外图书又不很方便，所以著作的翻译有时带有相当的偶然性和盲目性。即便是有影响的好书，也因为缺少必要的参照和对立的研究，而出现一哄而起、风弥一时的现象。有的人将其奉若神明，有的人则钻进去出不来，使自己的思想蔽于一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如“三论”（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引入时，对我国的思想理论界产生很大震动，教育理论界也趋之若鹜，耗费了大量研究力量。人们只知有三论，而不知有三新论、现代化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理论及其他。又如，布鲁纳的《教育过程》翻译出版后，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引起了研究热，甚至到了言必称布鲁纳的地步。对此，一些国外学者感到莫名其妙，他们视为一家之言的学说在我国居然成为统治一时的思潮。为了避免这种偏向的出现，编译丛书是个好方法。美国的约翰·威利父子公司曾在1963年出版了格弗·克内勒主编的“教育基础知识”丛书，此后纽约的哈珀与劳出版公司，英国伦敦的罗特利奇与基根——保罗出版公司等等，在欧美不少国家都相继出版了许多教育理论丛书，涉及到教育原理、教育中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教育的传统与变革、教育与国家发展、教育的问题与危机、教育概念、教育评估等等，极大地丰富了教育思想，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丛书的优势在于，它能满足多方面的理论需求，为当今和未来的教育工作者提供充实的资料。在我国，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译丛，但集中反映二十世纪国外教育理论方面的还没有，我们组织编译的这套译丛是一个尝试，也为了适应社会这一需求。

当然，先进理论的引进和传播并不是我们的目的，了解西方也并不是要全盘西化或资本主义化。我们的目的是振兴和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和水平。在这一点上不仅我们应有正确的认识，国外许多学者也都提出过相同的看法。瑞

典学者英格玛·法格格德与澳大利亚学者劳伦斯·杰·萨哈在其合著的《教育与国家发展》一书中就特别提到了这一问题。他们认为理论的研究是必要的，但要避免因理论著作的杂乱无绪和理论家各执一说带来的困惑和局限，要立足于建立合乎自身发展规律的教育理论，要因时因地制宜。我们相信经过这些年的理论摸索和实践锻炼，我们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已初步掌握了学习和研究国外理论的正确方法，盲目排外和盲目崇洋都是为人们所抛弃的做法，人们开始学会分析、比较和思考。

应该指出，“译丛”的容量是有限的，只能在一定数量上和一定范围内提供借鉴，形成比较，不可能面面俱到，其主要原因是出版数量的限制，也因为避免与已出版的各种教育名著重复。至于译校的水平，请广大的专家、学者及读者多多赐教和批评。

这套“译丛”得以顺利出版，除了有安徽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大力支持外，北京的教育与科学普及研究所、华星计算机开发公司也给予了多方面的协助，在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目 录

“二十世纪外国教育名著译丛”总序	程方平
第一章 教育的目的	1
第二章 政治与教育	23
第三章 国家主义与教育	56
第四章 经济对教育的影响	77
第五章 教育与哲学	101
第六章 教育与心理学	139
第七章 教学方法	170
第八章 教学方法(续)	201
第九章 课程	242
第十章 课程(续)	276
第十一章 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	297
第十二章 正规教育 and 非正规教育	338
第十三章 初等教育	364
第十四章 中等教育	393
第十五章 高等教育	429
第十六章 教师的职业教育	468
第十七章 公共教育与私立教育	513
第十八章 教育行政与视导	550
第十九章 学校与进步	594

第一章 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目的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广义的、综合性的，就是说，它适用于许多人和一个长的时间，不考虑那些模糊的或有争论的特殊目的；另一种是狭义的、有局限性的，它适用于特殊的个体，适用于特殊水平的正规学校教育或特殊的职业教育。本章的意图在论述广义的教育目的。

关于广义的教育目的，从前已有许多论述。这些不同的论述，引起了许多长期争执的问题。教育的目的是怎样确定的？必须根据时间和地点变化吗？是否有的教育目的由于它们的不变性，超出了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有关教育目的的论述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受到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受到人们不同的哲学和宗教观点或对心理概念的不同理解而制约的呢？

· 以资源的保存为目的

在原始社会时，非正式的教育也许没有清楚的目的，即使有，大概也是同生活本身的目的相一致。年青人的目的是向成年人学习未来生活中要经历的事情。因此，教育的目的很明显是保守的，是为了保存和传播已有的社会经验和社会财产。事实上，社会存在取决于对资源的保存，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体，教育的目的都是为了集体的生存。在这里，集体与个体没有什么区别。在

当时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任何同集体偏离的个体的目的都是不能容许的。在教育目的问题上，个体的任何不恰当的新发展，对原始人来讲似乎比一场灾难还严重。

原始人的教育目的，不能顾及到各个方面，只能限于对社会资源的保存，也就是为了使生产技术和社会习俗一代一代往下传，进一步地说，他们的目的在于后代的生养延续。

可见，那时的教育目的是保守的。其实，即使到了远远超过了原始水平的早期文明时代，教育的目的明显的还是保守的。象在古代中国，它的古代文化教育几乎成了一种俗套。这种教育目的是为了维持一种不朽的、永存的、固定不变的社会秩序。它的考试制度的长期落后，正反映了这一点。考试制度是一种测量国家教育目的的间接措施。在当时已用火枪打仗的时代，中国选拔武官仍要测验射箭术，这说明中国的教育目的长期不考虑同生活环境的一致性。教育的目的不是为儿童加入成年人的活动做准备而是为教育而教育。几个世纪以来，在中国，受到理想教育的人仅是学者。诚然，学者也是国家的公务员。但是在后面几个世纪，学者所学习的内容同国家事务毫不相干。中国的教育目的就象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样神秘莫测。学者们使用的语言文字除了他们自己面外，没有人可以明白。

古代中国之所以坚持保守的教育目的，纯粹是由于社会习俗的惯性力量，而古印度的教育目的的保守也是由于哲学体系的原因。印度主要寻求“涅槃”（佛教用语，指所幻想的超脱生死的境界）。在这种状况中，一个人独立的个性被融于宇宙的普遍精神中。既然这就是生活的理想，那么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耐心服从和驯良。因而，在古印度，这个东方国家，对西方社会的教育目的，诸如爱国主义、经济繁荣、社会进步、个人奋斗、个人职责、自力更生等根本不予考虑。

古希伯来人的文化也存在一种内在的保守倾向。《旧约全书》称赞希伯来人的教育：“教养儿童，走他应走的路”，保证“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这种教育也延续了基督教几代人。不仅这样，在“十条训诫”中的第五条还写道：“当孝敬父母”，强调尊奉父母的社会的准则。

甚至早期西方文明的希腊教育也反映出一些东方的保守的影响。例如，斯巴达人的教育几乎就象早期原始的东方教育一样严格、保守。在斯巴达，社会存在主要取决于斯巴达人的军事能力，统治者完全凭军事能力来保证他们凌驾于顺从的民众之上。因此，斯巴达的教育目的同培养军人的品德——勇敢、耐力、尊重和服从上级、爱国主义、忠于民族相一致。斯巴达的教育目的不仅忽视了怜悯、同情、宽宏大度等最美好的品质，而且有意培养冷酷无情的精神。

以培养公民为目的

东方和西方的教育目的之间的区别最早曾在古希腊雅典的市志上叙述过。在这里第一次清楚地记载了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保守的而且是进步的。雅典人之所以取得这样的进步是因为他们在对波斯的战争获胜以后，个人有政治和经济上的保障来研究教育目的。这导致了一场新的、私人的和个体的教育目的与旧的、公共的和社会的教育目的之间的争论。它的结果是重新制订和论述教育目的。制定新的教育目的的原则：不仅要考虑社会存在，而且要考虑到个体的发展。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新的教育目的较前有了进步，而且产生了西方的进步教育。

雅典的教育目的也可以由一定的美学标准来区别。因为在雅典那个时代以前或以后都没有人考虑到美学。在教育目的的问题

上，雅典人寻求各方面的平衡，他们一方面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身体、道德、智力、审美都得到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也谨慎提防畸形发展。他们把身体健美和教育目的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除此之外，亚里士多德严厉地批评了斯巴达人为了军事目的，过分强调体育，残害青年，忽视青年的智育，把他们下降到手工艺者的智育水平。斯巴达还让青年学习象长笛这样的乐器，亚里士多德认为是降低到了专业演奏者的水平。希腊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公民教育。希腊人认为，一个好的公民应该是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人。更重要的是，青年应该学习一个好公民所应具备的种种优秀品德，象稳健、勇敢、高尚、公正。希腊人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青年的自制能力。这不仅被实践证明了，而且被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学者们证明了。

在《理想国》这部书中，希腊伟大的教育家、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把市民区分为三等人：劳动者、军人和哲学家。由于各等人对这个城邦所担负的特殊的使命各不相同，其培养目标也就各有所不同。哲学家的培养目标自然是最高的，而为哲学家的职责是领导国家。由于这个原由，有人认为希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哲学家。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一位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著名的哲学家，用更普通的术语来表达公民教育的目的，他认为作一个公民最基本的是作一个自由民。自由民有两个尺度：一个是政治，另一个是经济。在政治方面，自由民可以当兵、选举、担任公职；在经济方面他无需干奴仆所干的那样卑贱的活儿。适用于自由民的教育目的是自然教育。自然教育的目的在于开发智力。因为智力和判断是一个人区别于野蛮人的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按照自然教育的最终目的，人不仅能成为最佳公民，甚至可以达到自我生活的最高目标——幸福。

在关于市民教育目的问题上，雄辩家和哲学家存在着分歧意见。雄辩家的兴趣在于培养出有政治、军事头脑以及有文化有风度的绅士。雅典最受欢迎的雄辩家之一的伊苏格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338）说：“这是我对于有教养的人的定义。”又说：“首先，他能够轻松愉快地处理一般生活中的事务和具有找到正确行为途径的才能。第二，他的行为在任何条件下总是端正和适合的。如果被野蛮的、不友好的伙伴抛弃，他应以非常轻松友好的态度处理这件事。他对待每个人都应该公正、有礼貌。第三，他可以适当控制自己的行为，得意不忘形，失意不悲伤，表现出男子汉的英雄气概。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不娇惯、高傲，也不为成功冲昏头脑，而总是表现出聪明的举止。对于机遇赋予他的成功应比凭自己的天才和智慧获得的成果更应持节制的态度。”

在早期罗马文化中，罗马教育同雅典一样被以培养市民为目的所局限。罗马人的目的是反复给它的青年灌输坚定不屈、坚韧刚毅、勇敢的品质，虔诚、敬仰上帝的感情，以及谦虚、自制、严肃、谨慎、正义的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动机同希腊是截然不同的。希腊人追求各方面教育、美的平衡，而罗马却出于政治上的要求，它的目的更实际。

也许由于这个原因，罗马人没有在理论上详细地总结它的教育目的。昆体良（Quintilian，35—100）在他的修辞学院里，甚至把培养雄辩家作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他没有从理论的原则上来说明，只是描述了那个时代的理想和典范。“我的目的”他写道：“是培养成功的雄辩家。对于一个雄辩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他首先应该是一个优秀的人。其次，他不仅具备善辩的才能而且具备所有优秀的品格……这种人是优秀的公民，有能力完成集体和私人的事务。这种人能通过议会的形式统治国家，通过

立法使国家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通过他象法官一样的决定，清除国家的罪恶。这种人无疑是我们所要求的雄辩家”。

以基督教的拯救为目的

总的来讲，希腊和罗马的教育目的是世俗的。它不管普遍的道德，因为他们的道德特性是公民的，而不是宗教的，是自然的而不是超自然的。而基督教是以宗教的、超自然的教育目的为传统。这种倾向非常明显，至少在编写《箴言》时就已存在。编写《箴言》这本书的目的正如前言所讲的“要使人晓得智慧和训诲，分辨通达的言语……使愚人灵明，使少年人有智识和谋略”。此教育目的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习节制享受，避免懒散，尊重自然的世俗的智慧，以及象勇气，自我牺牲和忠诚等这样的品德。另一方面是学习自然本身内在的智慧，特别是提供超自然的依据。为此，《箴言》的编者要求注意这样的事实：“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

这种唯心的形而上学的教育目的在《新约全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阐述。在《新约全书》里耶稣成了非凡的智慧和聪明的化身。基督教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人更加基督化。不仅在罗马时代，而且在罗马后的所有世纪中，圣经的传授和耶稣受难从根本上影响了教育的目的。基督教徒把它的教育目的从希腊罗马准备世俗生活的教育目的转向未来世界的不朽的生活的教育目的。因为基督教认为世界的末日即将到来，所以它极大地忽视了当前的教育。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精神的目的制约了教育，而精神的目的又是由世界万能的上帝所制约的。

注重来世的精神方面的教育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中世纪的修道院生活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些首先修订象禁欲主义教规的

人对拯救他们的灵魂很感兴趣，因为救世的方式就是拒绝物质和言语的引诱。教育的目的转向禁欲。为了精神的道德的成长和发展，出现了很多别出心裁的惩罚肉体的方法。

到了中世纪末，获得社会 and 个人的新生成了宗教戒律的目的。哲学家们从抄写这方面的手稿转向研究这些手稿。希腊哲学被用来支持基督教的理论。教育的目的扩大到培养研究这方面知识的人。于是训练身心成了教育的主要目的。天主教多明我会(Dominican)的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 1225—1274)，最伟大的天主教神学家，联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指出教育的目的象生活本身一样，是通过培养精神和理智的品德获得幸福。

比为修来世幸福的禁欲生活的教育更现实的是同时期的骑士教育。由于培养传教的牧师是中世纪宗教教育的最终目的，培养骑士就成了中世纪世俗教育的目的。骑士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培养一个人有极大的勇气和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使他粗鲁的战斗精神要在绅士信条的纪律约束之中。这明显地说明了基督教道德伦理观的影响特征。骑士教育要求青年侍从和少年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为他人服务，要求尊重骑士的荣誉，尊敬上帝，关心弱者和下级。尊敬妇女也被补充为教育目的的主要内容。

以培养绅士为目的

从公元十世纪到商业贸易的复兴预示了农村封建堡垒和修道院霸权的每况愈下，随之而来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都市生活。一个新的更加世俗的教育目的出现了。人们对与上帝同在的不朽生活感到厌恶，沉浸在重新发现周围世界的兴奋喜悦之中。这种新的有活力的自由发展的教育叫人文主义教育。人文主义的教育目

的在最伟大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之一的伊拉斯莫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的论述中很好地概括了。他指出:教育的“首要的作用是脆弱的灵魂在虔诚的种子中得到满足;第二,理解自觉学习的重要性,并能够自觉学习;第三,学习一些有关生活的知识;第四,从童年起,就习惯于文明礼貌的方式。”因此,新的教育目的,一部分是希腊—罗马自由教育目的的复活,另一部分是追求不朽的灵魂的宗教教育目的的翻版,还有一部分是继承世俗的骑士教育的目的。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教育目的的具体体现是培养宫廷官吏。有关培养宫廷官吏的详情在当时的一些协议上出现过。如康特·保德森·凯斯蒂格林(Cente Baldassane Castiglione)的《官吏》和托马斯·伊雷特爵士(Sir Thomas Elyot)的《统治者》。看到国家权力集中在官吏和统治者手中,一部分人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统治者。由于负责国家事务,这些官吏显然需要法律知识和雄辩术方面的训练。这些官吏同时也在闲暇时间娱乐,以满足精神上的需要。因此,需要语言学方面的训练,以便能在希腊和罗马文学中找到更丰富的乐趣。除此而外,做诗、抚琴会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也会增加对别人的吸引力。这些都是绅士教育的主要内容。当然,身体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此外,要求官吏在宫廷的社会事务中表现出高贵、优雅大方的风度。

应该指出的是,当时的教育虽然认为官吏应该具备有知识的头脑,但并不认为他们应该成为博学的人。“我们必须区分一个经过礼貌学习的人和一个纯粹的学者。”英国人丹尼尔·迪福(Danie Defoe)写到:“前者是一个绅士和一个绅士应该怎样的人,后者是一个纯粹的书籍、一札信件、一个塞满了莫名其妙的话语的脑袋、一个人——有舌头却没有语言,具备所有的感官而没有能力。一句话,知识丰富却无法表现。”确实,有礼貌的